主编:钟华 编辑:温才妃 校对:么辰
E-mail:daxue@stimes.cn

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

做好课堂内外的艺术教育

■本报记者 韩琨

一进入春天，北京即将迎来两项重要的文艺活动，一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再就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两者都是影迷的节日，而后者则更与大学生们息息相关。

而到了夏天，则会有一批来自海外的大学生来到中国。他们深入到一座座城市，用他们的眼睛亲自看一看中国，用他们手中的镜头亲自记录中国。

无论是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还是举办了5届影响很大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这两项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都与一个人息息相关，她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

虽然已年过八旬，平时戏称自己也算是“80后”的黄会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依然神采奕奕，对过去几十年里许多事件的相关人物、时间、地点都记得十分准确，记者分享了她对于如何做好艺术教育的亲身经历以及真切思考。



>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艺术教育的核心就在于两个字:塑造。只要教育者用心，就可以塑造良好的品德与心灵，学生是能够明白和接受好的教育的。

艺术教育必不可少

《中国科学报》:就您的体验而言，大学生艺术教育目前在国内高校开展得如何?

黄会林:结合个人体验来说，在大学生电影节创办之前，上世纪80年代，我从事戏剧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时，就在老伴、作家绍武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社。当时起“北国剧社”这个名字，含有“仰慕田汉老，追踪南国社”的意思。南国社是上世纪30年代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剧社，是五四运动以来推动新剧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而当时，北国剧社也成为了新时期我国第一个高校学生戏剧社。

要知道，北国剧社的学生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话剧和表演的经验，但剧社最终打造出来的演出，却有着令人赞叹的专业水准。许多剧社成员都向我表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以后都会继续在戏剧的道路上前进，但大学里在剧社的这段经历，却对他们每个人都影响深远。

除了剧社成员外，北国剧社本身对于师大的校园文化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在学校剧社看的演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第一次话剧体验。事实上，这就是一种课堂之外的艺术教育。

我一直认为，大学生“德智体美”，“美”即艺术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缺失与否的差别尤其大。因此，作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我多年来一直反复呼吁，强调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我国的教育方针“美”字是不可或缺的。

至于课堂方面，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在二十余年前就组织师资面向全校学生开设艺术教育选修课。艺术教育对于学生来说必不可少，那么，艺术教育的师资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无论选修的学生有怎样多元的艺术爱好，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等，学校都应当保证其有接受艺术教育的平台与机会。

属于大学生的电影节

《中国科学报》:当年您和同事们是怎么想到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

黄会林:这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学科的建设密切相关。1992年，学校根据艺术教育的发展态势，决定扩大艺术教育的内容，把影视教育纳入新的“艺术系”。

接受任务后，我们便着手工作。当时，如何组建好学科、树立起特色和品牌，都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创办三年，我们迈出了“三大步”，其中的第一步，就是第二年春天，我们成功创办了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当然筹备过程很艰难，遇到很多问题，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做出一个真正属于大学生的电影节，以“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为宗旨，打造“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拍，大学生评”的特色。大学生是年轻而充满希望的，大学生属于春天，大学生电影节当然也应该在春天举办。

《中国科学报》:如今，您如何评价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响?

黄会林:应该说，在师大校内，许多学生都享受到了大学生电影节所带来的“福利”。这既包括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展映电影票价，还包括无法量化计算的艺术熏陶，更不用说那些亲自参与到大影节辛苦繁忙的筹备工作中的学生们，他们得到的锻炼更多。

值得高兴的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响不仅仅在大学校园，受众也已经超越了北京大学生这个范围，大影节甚至在海外设立了分会场，多年来，受到电影界专业人士的认可与重视。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在无形中给大学生们以陶冶，而大学生的欣赏水平会反过来影响着电影业界，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

在我看来，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艺术教育的核心就在于两个字:塑造。只要教育者用心，就可以塑造良好的品德与心灵，学生是能够明白和接受好的教育的。而艺术教育对于提升人才整体的人文素质来说，必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信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2015年1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题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的重要演讲，赞扬了新加坡青年通过中国元素了解和传递中华文化。

演讲中提及的几名新加坡“90后”大学生来到中国西北的活动，正是2015年度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活动。虽然这对于参与项目的学生来说只是普通的艺术创作活动，却因为跨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为了备受肯定的文化交流，影响很大。作为项目主要发起人，黄会林被评为2015年度“感动师大”新闻人物。

《中国科学报》:您能介绍一下“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这一项目的缘起吗?

黄会林:这一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的成立，则与我提出的“第三极文化”理论相关，希望从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到“会通以求超胜”。事实上，在学术方面，我一直倡导中国影视理论研究必须建构中国的、民族化的影视美学，我国的影视艺术教育和影视艺术学科建设，都应当体现这种特色与自信心。因此，我们欢迎其他国家的青年来到中国，亲眼看一看真实的中国，感受中国文化。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项目于2011年正式启动，对于参加活动的外国青年来说，只有亲身体验真实的中国，才知道原来北京的机场可以比发达国家的机场设施还要现代化，才知道真实的中国原来并不是电影《红高粱》里的场景。

《中国科学报》:给予这些外国青年具体的支持和要求分别有哪些?

黄会林:事实上，我们对他们拍摄的内容不作任何限定。只要求他们用两周的时间，进行考察和拍摄，争分夺秒地投入创作。与此同时，无论他们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苏州或者西北等地，我们都组织了合作高校，由当地的大学生担任向导、制片，为拍摄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项目做得很成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传播效果。通过项目来“看中国”的外国青年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在计划结束后，他们与一同工作的中国大学生难分难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美国大学生创业见闻与思考

■胡望斌

利用访学的机会，我在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旁听了几门与创业相关和感兴趣的课程，上课期间我同讲课教授、学生围绕一些创业问题和现象展开了交流和探讨。以下是我的一些体会。

全球创业观察(GEM)2014报告提供了一组数据:2014年美国参与创业或者经营企业的人数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4%;美国25岁至34岁人群中选择创业或者经营新企业的比例达到18%;美国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达到20%~30%;美国成年人中认为现在是创业好时机的比例超过50%。而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很多教授甚至认为创业教育“用力过猛”的中国，一些相关数据却并不乐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差距的存在呢?

首先，大部分上课的美国学生都谈到在美国创业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很普通、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从娃娃抓起的美国创业教育，从小学就有很多的创新创业类的作业和训练，那时他们甚至就对产品开发和创业流程有了一定的了解。而在大学课堂上，大量的创业企业CEO、学生创业团队、创业投资和孵化人员的课程参与，更是拉近了学生与实体创业的距离感。

其次，美国给予创业极高的精神鼓励，也促进了美国大学校园内学生自主创业的浓厚之风。创业精神被认为是构成美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超过90%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是一项十分令人尊敬的工作。创业成为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伊丽莎白·霍尔姆斯等，几乎成为每个学生心中的梦想。

第三，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美国学生对创业失败的态度。国内影响大学生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害怕失败，尤其对女性创业者更是如此。而在大多美国学生看来，创业其实从不会失败。因为在美国创业失败者并不会被打上失败者和耻辱的烙印。相反，他们认为从失败经验中积累了知识和智慧，并将此看为无尚荣光和一种荣誉勋章。以前的创业失败者甚至会得到更多的创业投资机构的青睐，比初次创业者拥有更多的股份。这让我想起美国管理学家W·古特雷的那句话:“每一处出口其实都是另一处的入口。”其实，害怕创业失败进而对创业行动犹豫不决，的确是可以免去失败的机会和可能，但与此同时也自然会失去了成功的机遇。

美国的大学毕业生甚至在校学生创业蔚然成风，有做平台类创业的，有做科技创业的，也有部分做实业类创业的。而在教授们看来，美国校园的创业潮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十分注重培育创业生态系统，所以美国的创业生态圈相比中国要成熟很多。美国政府尽力打通产、学、创各个环节，多项措施确保大学校园创业商业化、产业化的顺利开展。比如，发起“创业美国”计划以利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深度合作;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在大学附近以便于联合开展研究;与大学合作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制定有利于大学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拜杜法案》《技术转移商业化法》等法律法规;注重引导大企业和新创企业的创新合作等等。创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美国政府也提供一系列措施来为创业项目保驾护航:鼓励考夫曼基金会每年捐助近亿美元来资助新创业项目;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多个资金投入巨大的政府资助项目计划;严格保障创业者的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建立大批校园创业孵化器以及专业创业加速器……

对于未来创业的趋势，笔者通过和教授们的讨论，也有比较一致的观点。在当下尚未有太多大品牌坐稳的移动互联时代，谁都会有机会，这对大学生创业是利好的。但因传统互联网公司依然影响力巨大、移动互联网混战中也已逐渐形成一些巨头，创业竞争会空前激烈。只有那些能及时发现用户需求并快速转化为商业机会的创业者才有希望。所以创业者的创新思维、更快速的行动、更高专注度、更深的细分领域、更精准的移动互联新兴领域判断、运用互联网思维做价值观营销、建立价值后移模式(类似商业模式中的饵钩模式)等，从而实现与巨头错峰而快行就显得十分关键。而从稍微长远来看，全球面临的冲突、能源、环境、健康、人口、交通、城市化等诸多挑战将会孕育更多突破现有过于注重互联网用户琐碎需求的创业机会。

当前的创业时代，正如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所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今天的过剩经济时代，创业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过剩的。而如何把过剩变为紧缺，是每一个创业者需要考虑的。精益创业的理念很好，但我认为精益可能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不一定是最终目标。中国企业大多习惯学习和模仿的模式，因而中国企业甚至中国经济长期难以摆脱从1到N的困境。而多借鉴美国的经验，真正实现从0到1的突破，进行创造性破坏、改变游戏规则的创业企业涌现，才应该是我们乐于和亟须看到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记者快评

高校信息究竟为谁公开

■温才妃

日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先后发布了高校信息公开报告。在两份报告中，教育部直属高校都取得及格以上的成绩，尤其在后者的报告中，更是以78.32分明显高于非直属高校52.22分。

成绩的背后，由于教育部对高校信息发布“只有一个底限要求”，细究下来，还是可以发现若干问题。如报告中反映的，高校相关网站用户体验差的问题依然存在，部分高校不重视信息及时更新与日常维护，栏目空设、未提供链接，网站运行不稳定，公开信息质量欠佳。

这些问题不禁让人质疑，高校信息公开究竟是给谁看的?如果是给广大的市民群众，理当事无巨细地呈现信息，回答人们心中的疑惑，也不至于出现信息不分类、用分辨率低的图片公示收费、公开的信息“短斤少两”等问题。如果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满足了主管部门规定的底限要求似乎也就够了。因为主管部门不会为着细节不完善，处置某一高校。

眼下，部分高校由于未触及眼前利益、未有问责机制，对信息公开缺乏主动性。而实际上，信息公开不仅是防止高校腐败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义。大学办学要对社会负责，接受社会监督在国际上是通行的作法。而信息透明化则是公众、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前提，只有坦诚地公布信息，回应社会、公众的疑惑，才能在重大决策、敏感事件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与理解。反之，封闭办学的结果无疑是使自己失去公信力与声誉。

就像即将启动的招生宣传工作，家长、考生报考最关注的是就业，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对一所高校人才培养成绩认可与否。为此，没有一所高校不尽心竭力地公开信息，只有如此，在各种正面、负面信息的对比分析中，家长、考生才能作出最理性的选择。因此，被社会周知才是大学办学对社会负责应该做的事。

也许未来在一桩桩特殊事件中，高校会逐渐意识到信息公开并非“弊大于利”。对于当下的高校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应加强框架设计，联合相关部门加大监督之责。除了行政力量之外，社会问责也应充分调动。切莫让高校信息公开成为“奉命不用心”之举。

域外传真

以本地化策略应对技能短缺

■迈克·博克索尔

近年来，英国逐渐表露出技能短缺的迹象，这是否表示英国注定要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失败者呢?三份最近公布的报告表明，这可能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前景。

在英国，我们没有足够满足英国雇主需求的有技能的年轻人。研究发现，他们的技能已远低于英国国际竞争对手的水平。如果这还不够令人担心的话，即便是那些拥有高级技能的劳动力也可能很快就会因为智能机器的挤压，而变得过剩。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的报告把熟练工人的短缺纳入其中。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达不到雇主期望的工作者，雇主们也抱怨说，这些人在大学时的就业准备就不充分。

这种悲观情况的前景可能更加漆黑，最近一份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称，调查发现，英国青少年在被调查的23个国家中，识字率最低，计算能力则排在倒数第二。据预计，到2020年，在中级技能方面，英国将在33个经合组织国家中降至第28位。

除此之外，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预测了很多看起来安全的职业将会消亡，如管理、会计和法律。分析表明，智能机器的兴起和全球性的破坏力将消除几乎每一个商业部门的各种职业角色。对此，唯一的防御将投资于那些计算机无法取代的人类技能，比如人际网络和创业精神。英国政府表示，英国国民技能的弱点“长期而棘手，只有最激进的行动可以弥补它们”。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之前定义的劳动力技能，同时重建开发系统，雇佣高技能的人。这意味着需要改革当前根植于特定职业需求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

在未来，可持续的职业生涯需要灵活的、跨度大的人才，例如复杂的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开展跨文化的团队合作。我们需要远离那些几乎是刚掌握就已经过时的技能，学会关注真实世界的学习经历。

我们必须打破旧的教育和工作生活之间的分歧，打破传统的学术成就和终身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高校、雇主和政府机构一起形成区域联盟，共同解决当地技术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在“伯明翰技能引擎”项目中已经开始实施。这是一个由5所大学、11个学院，加上雇主、公共服务提供者以及市政府结合在一起的联盟。他们通过制定当地的发展策略，然后合作培养满足需求的劳动力的能力。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这些组织共享资源和新的学习方法，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支持，他们还通过互联网的技能交换平台，使人才与当地需求的职位相匹配。特别令人兴奋的是，这使大学重新与它们成立时的使命相连接了:支持当地的教育，也促进当地社区和与合作伙伴的发展。

类似例子可以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找到。在那里，大学、行业合作伙伴和省政府共同建立了Chemelot联盟，以满足当地先进的化工行业的技能需求。还有英国的北安普顿大学，该校培养创造一些合作机会，与企业、公共部门等合作伙伴们一同开发本地人才。

这些当地联盟是否能够满足英国经济在21世纪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和才能，现在下判断为时过早。但是全球环境变化如此之快，我们必须迎接变革，也没有时间作足准备了。

(作者系英国教育咨询专家，韩琨编译)

高教视点

高校教材复印现象当休矣

■胡继飞

无论是名牌高校还是一般高校，在大学生中，约93%的学生有过为省钱而复印教材的经历，且超过90%的学生认为这一行为无可非议;在教师中，约95%的人知道学生中存在此类现象，但很少有人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更有约33%的教师也认为这一行为无关大雅。尽管访谈的样本量不是太大，但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比较准确的一组数字是，笔者对某教学班进行过现场统计，某主干课程使用的新版教材定价45元，网购优惠价为38元，全班91人中46人购买了正版教材，其余44人均是使用复印教材，复印价格约为16元，每本节约22元左右。长此以往，大学里的教材复印现象会愈演愈烈，更可悲的是我们的高校和教师对此现象已经熟视无睹甚至欣然接受。

在教材复印行为中，获得好处的自然是学生和复印商，受损的当然是作者和出版商。这一行为是否违反著作权法?真还难以一言蔽之。对学生而言，复印教材是自己学习之用，并未用作商业用途，所以法律上并无过错。但从道德层面来讲，却有违学术伦理，是对知识人的极端不尊重。对复印商来说，整体复印出版物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当属一种违法行为。当然复印商仍有辩解的空间:学生主动拿教材来复印，作为复印商并无鉴别是否恰当的义务，事实上也无法鉴别这些行为是否合理合法。

要治理高校的这一现象也并不太难，关键还在于任课教师的态度。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还是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如果我们的高校和大学生不懂得尊重知识和知识产权，这是一个国家文明进程中的耻辱。而这也正是我国教育的一大缺失，以至于论文抄袭和学术造假现象频发。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教育甚至可以从规范学生的作业开始，因为将他人文章当作自己的观点来交作业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在英美国家的中小学都是不容许的)。同时，如果发现有学生因图谋差价而复印教材的现象，任课教师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并责成改正。作为文化人，尊重知识也是尊重自己。

二是教材的出版和选用要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近些年出版的教材价格普遍看涨，这是造成学生复印教材的主因。国家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有一条规定，就是要使用规划教材和最近出版教材，事实上越是新出版的教材价格越贵。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教材出版应尽量减少书的厚度和降低定价;另一方面教师选用教材时要适当考虑价格因素，尤其不要选用那些超出教学需要的大部头教材。

三是应加大惩戒力度。高校校园内开设有不少的复印店，有外来人员开办的，也有学校官方开办的，为学生复印教材和其他资料是这些复印店的主业。如果复印的仅仅是教材中的少部分章节，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是对教材整书的批量复印，就应该有所警觉和判别。批量复印正式出版物用于商业目的，显然是违反著作权法的，应该受到惩处。

一方面，对确有困难的学生给予资助。对家庭经济状况极度不好的学生，学校应该给予一定资助，如此才能使得因家庭困难而复印教材的理由不成立。另一方面，学习是需要成本的，教材费就是大学求学过程中名正言顺的一笔开支。我们一些大学生舍不得买三十几元的教材却花上百元呼朋唤友看场电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消费观呢!所以，对此类学生也应该给予适当的惩戒。

(作者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生物学院副院长)